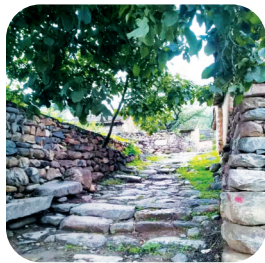


花塔

□ 侯建臣



是什么时候听到花塔这个名字的呢？好像有些年了。

那时候的花塔似乎还没有出名，至少在大同这地方，好多人还不知道。

最早听到这名字，以为就是一个塔，比如城墙上的雁塔、禅房寺砖塔、圆觉寺舍利塔、法华寺白塔，再比如觉山寺实心砖塔。说起来大同的塔真是很多，有大的小的，有砖的木的，有实心的空心的，有方形的圆形的……如果把大同五花八门的塔们放在某一个空间里，绝对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宝塔博物馆。

对花塔感兴趣，起初是对这个名字感兴趣。想象那塔是肃穆古典的老塔，花是红黄蓝白的鲜花，在鲜花的簇拥之下，老塔像一位敦厚的长者，不时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慢慢就变得鹤发童颜起来，檐上的风铃“泠泠泠泠”地响着，像是他开心的笑声，在旷远的时光里久久地回荡。鲜花们呢，一齐仰了头，想从老塔的宽檐上、砖雕上看到什么；想从绕塔飞翔的燕语和风铃声中听到什么。看着听着，许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让她们都捂了嘴笑了起来，把远远近近的风都招了过来。又想象那塔本就是花做的，一层是黄色的，一层是蓝色的，一层是粉色的，一层是红色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花们踮着脚尖，踩着肩膀，攀着臂弯，拉着手，便有那最上边的触到了天空里飘着的云；也或者是，每一层都有各种颜色，每一层红黄蓝粉按着不同的次序拥在一起，又把上一层高高地托起，反正是，她们层层叠叠拥在一起，由大到小，由宽到窄，慢慢就拥成一座塔。

其实，这都是我的想象，花塔其实是灵丘县独峪乡的一个村子。

据说是因为村子后边的山形很像一座座塔、且山上到处都是桃花，村子起名“花塔”。

花塔村四面环山，高低错落，只有一条河流从中间通过。若干年前，山挡住了风，也挡住了村民出行的步子，因为交通不便，村民基本上过着与外界隔绝的日子。是一九七五年的某一个早晨或者夜晚，公社、村里的干部坐在一起谈啊谈、谈啊谈，他们这样坐在一起谈了好多个早晨或者夜晚，这一次终于不知是谁指了指远处的那座山，说了一句话：打通它。然后是谁跟着说了一声：行。于是所有的人都点了点头。第二天，全村男女老少都出动了，扛锤的扛锤，拎钎的拎钎，一齐走向了那座挡在面前好多年的山。

是谁砸下了第一锤？是谁搬动了第一钎？是谁赶着毛驴把第一袋乱石碎碴驮走？这些人们记不清了，但那叮叮当当的声音，似乎还一直回荡在山与山之间、沟与沟之间、树与树之间、草与草之间……

十年光阴不寻常，钎秃了多少根，锤换了多少个，没有人能说得上来，但一个石洞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从那洞的深处看到了光。当科技还没有发达到一定程度，愚公精神是最坚硬的钢钎，也是最有力的锤，无论行路之难还是

开路之难，都挡不住一种叫“信念”的东西。全长八千多米的红沙岭隧洞，把一种精神永久地嵌在了路与路之间，也永久地嵌进了花塔村的村史里。随着人们的广泛宣传，这些年世外桃源般的花塔村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了都市人心目中的“桃花源”。2019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公布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花塔村被列入其中。

去花塔的路上，中国古老的内长城巍峨地沿着山脊由东到西，高耸的箭楼虽然显出了老态，但依然保持着千年的雄姿。新建的门楼上雕刻的对联告诉人们花塔已近，门楼的正面，横批是“生态民俗第一村”，两边分别是“花塔荣春晖塞外明珠山外雨”“三楼留胜迹明时长城秦时风”；门楼的背面，横批是“陶潜居地”，两边分别是“花放不语独成世外景”“塔开洞天峪满桃源色”。离此不远，就是那一条充满传奇的隧洞。隧洞虽然很长，但非常笔直，从洞口这边一眼就能看到另一边，只要一边有车进入洞中，另一边的车远远地看见了。随着车辆从阴暗潮湿的隧洞里出来，眼前一下子出现了不一般的景色。绿荫拥路，花香四溢，正应了那句古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走下坡，慢慢就变得平坦起来。在村庄的一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河流两旁长着高大的杨树和核桃树，一年四季陪伴着村子，也陪伴着世代代的乡民。村里的房子大多随地势而建，高低不一，错落有致，俨然就是五柳先生《桃花源记》里看到的村子。沿着村子一直往里走，尽头是一条宽阔的河沟，水从其中两座山的中间穿过来，在这里稍作停留，又从另外的两座山之间流走了。顺着新修不久的软桥走到河的对岸，向上是一座不算太高的小山，山上披满了绿色的小树和杂草，野花开放，野果串串，不时有幸福的山鸟唱出婉转的歌声。山脚下是一条深沟，顺着沟走进去，核桃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核桃，溜圆溜圆；花椒树上结着星星点点的花椒，浓郁的花椒味四处弥漫，涩涩的、麻麻的，感觉过往的风、流连的蜂蝶和阳光都是花椒的味道。沿着沟一直往里走，会看到山枣，会看到枸杞，会看到流苏一样的芨芨草、金丝草和针茅草们把阳光编成了长长的丝线；而那些狗尾巴草们则把毛茸茸的尾巴高高地举起，让贪玩的瓢虫迷失了方向；还有一大片青青的翠竹让人感觉到俨然到了秀美江南。

有人说过，进花塔的路有三条，一条是人的路，在隧洞；一条是水的路，在河沟；一条是风的路，在山上。其实还有一条，那是回归自然的快乐之路，它就架在这三条路之上……



大同贡道、马市与“万里茶道”（一）

2021年7月8日，首届“万里茶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这无疑会对“万里茶道”申遗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间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它纵贯中国南北。主要时间为17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的300多年间。而大同，有研究成果表明，它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城市。

实际上，大同在“万里茶道”中的估值应该更高，它不仅只是“万里茶道”的一个节点，更是“万里茶道”中的一个重要枢纽。是来自南方的茶商和来自北方的客商的一个商贸集散地。“万里茶道”通过大同这一枢纽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链结。最终形成一条以茶叶、丝绸、皮毛等为主要贸易内容的国际贸易商道。而“万里茶道”的形成，更与明代的“大同贡道”是分不开的。

明代的朝贡与朝贡贸易

朝贡最初是边疆地区民族、部落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原王朝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向中原王朝贡献方物的形式，表示对中原王朝国家的臣服。此后，逐渐演变为藩属国家对宗主国的一种礼仪形式。

朝贡过程中，由于方物的贡献与回赠，逐渐地在礼仪形式交往的同时，也形成一种物品的互通有无的关系，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到明代时发展到极盛。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便开始奉行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对逃往北方的北元蒙古势力释放出极大的善意和诚意，希望与北元蒙古势力，在承认明朝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友好相处。而在各国与部族对中国的进贡中，则采取“厚往薄来”政策，以“怀柔远人”。凭借这种睦邻友好政策，到永乐朝后期，明朝已经建立起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系。

在明朝的朝贡体系中，除了需要经

海上进入明朝进贡的藩国外，陆路进贡的主要为西域的哈密、撒马尔罕、帖木儿等，北部的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以及东北的兀良哈蒙古部落、朝鲜国等。特别是北部蒙古各部，虽然因战争问题与明廷的通贡时断时续，但做为明朝对蒙古各部的一种羁縻手段，明廷对各部总是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蒙古各部对明朝的进贡，无论就入贡的人数还是物品来说，都是巨大的，远超其他各国、各邦，成为明朝对外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蒙古的进贡与大同贡道的确立

明朝建立后，元朝皇帝被迫逃到了北方草原，并继续在草原行使着统治，史称“北元”。洪武二十一年（1388）“北元”覆灭，到明永乐朝时分裂成三大部，分别为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三部中，最先和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是兀良哈部，其它两部则叛服不定。皇帝朱棣对两部顺则抚之，逆则剿之。在朱棣剿抚并用的战略下，永乐七年（1409），瓦剌部与明廷建立了封贡关系，永乐十一年（1413），鞑靼部也同明廷建立起了封贡关系。

使臣入贡要有人关的关口，和行使的路线，即所谓贡道。在蒙古两部与明廷通贡之前，从洪武时起，就已经有西域的畏兀儿、撒马尔罕、别失八里、帖木尔等政权或部落与明廷发展起了通贡关系。贡使由甘肃入关，经由甘肃进入南京和后来的北京。

永乐七年（1409）八月，皇帝朱棣“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闻塞外有径道，自甘肃七昼夜可达北京，即遣人踏至宁夏，又自大同踏至北京。果自几程？果若近便，今后驿使只于此路往来。’”踏勘后，大同便被确定为蒙古使者进京的贡道了。《大明会典》记载，鞑靼部与瓦剌部“贡道皆由大同入居庸，兀良哈部由喜峰口入”。

吴天有

随手拍大同



眼前的风景

王芳微



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编辑部地址：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电话：0352-2050272
邮政编码：037010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1402004000009

电话：0352-2429838
广告热线：0352-5105678

发行热线：0352-2503915

自办发行
全年订价：258元